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之五

万物皆有数：

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

王化平 周燕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专刊之五

万物皆有数：

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

王化平 周燕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宫 共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王化平,周燕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721-5

I. ①万… II. ①王…②周…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5186 号



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

WANWU JIE YOUSHU SHUZIGUA YU XIANQIN YISHI YANJIU

王化平 周 燕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03 千字

ISBN 978-7-01-014721-5 定价: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万物皆有数》序一

易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显学，在汉代刘向父子之《七略》中，《周易》列于《六艺略》之首，故居群经之首的《周易》，自古及今都受到学人的重视。20世纪后半叶很长一段时间，易学曾一度衰弱，但从结束十年“文革”后，特别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材料的出土，以及相继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中不少有关《周易》材料的公布，易学又焕发了勃勃生机，每年都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著出现，这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不可不谓新发现产生新问题，新发现推动学术新发展。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经文以及附在后面的“易传”材料的出土，使学界开始认识到早期《周易》的面貌原来有不少与今本不同。阜阳汉简《周易》有一大特点，就是在经文后抄有卜辞，用来说明占卜何事为吉，何事为凶，说明这个抄本是用于占卜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周易》，与通行本相比，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在卦名下面或卦爻辞后面画有一些标识符号。^①在去年刊行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也有与《周易》相关的新材料新信息。正是因为受到不断出土问世的新材料新信息的刺激，使得易学界对一些问题的探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比如关于重卦之人，古代经学家就有不同的说法。但由于材料缺乏，终究众口难辩，无有定讫。自从

^① 这些标识符号很有趣，有不少是朱红色的，甚至还有不少是不同形式的红黑二色套写的，这在以前从未见到过的，其中的深意，还未能确释。

张政烺先生提出将所谓“奇字”解读为易卦以来，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终于获得了能比古人更进一步的机会。因为就数字卦的材料看，在商代极有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六爻的重卦，即是如此，当然不能再简单地说文王重卦。当然，这样的说法也牵扯出另一个问题，即周人在《周易》的发展史上到底做了什么贡献？

化平博士这本新著《万物皆有数》，首先对数字卦的材料做了广泛的搜集，然后又做了深入的讨论，为重卦的起源发展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比如他通过解读殷甲骨上的数字卦及附于其后的文字，认为商代虽然出现了六爻卦，但未必就是重卦，并认为六爻卦与重卦当有区别。之所以作出这种区分，多少是受到了清华简《筮法》的影响。因为《筮法》篇虽然用八卦，也有六爻卦的形式，但实质完全不同于《周易》中的重卦。由此点出发，确实不可轻率地将甲骨或青铜器上的六爻数字卦等同于重卦的形式。

除重卦问题外，早期易学研究中还有一个长期云山雾罩的话题，那就是所谓的《三易》。在《三易》中，只有《周易》还有完整的传本，《归藏》和《连山》都仅有残缺不全的辑佚本。由于后两者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且两汉学者语焉不详，至东晋才被人们大量引用，所以长期以来被怀疑是伪书。1993年在湖北荆州王家台出土一批秦简，其中就有占卜类的文献，内中的很多文字与传本《归藏》相同或相似，因此被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归藏》。化平博士在书中专门讨论了这批秦简，从文本流传、卦名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批竹简与《归藏》以及《归藏》与《周易》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尤其是基于卦名的分析，认为通行本《周易》的某些卦名是受卦序影响而被调整的结果，指出卦序与卦名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数字卦与《周易》的关系也是数字卦研究中的焦点，大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卦就是《周易》的前身，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周易》六十四卦虽用阴阳二爻画成，但它在卜筮过程中是要用到筮数的，所以，说《周易》与数字卦全然没有关系是很难成立的。不过，简单地说数字卦就是《周易》的前身，又过于草率，如果能描述出发展过程，则会更令人信服。书中的第二章和最末的结语都探讨了这个过程，描述了从数字卦到《周易》可能要经历的一些变化，使数字卦与《周易》的关系更加具体、清晰。

新近公布的清华简《筮法》详细记载了一种数字卦的占卜方法和解卦、

原理。化平博士对这部古佚书做了初步的研究，并受它的启发探究了数字卦和易学文献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在分析《周易》卦名时，又用到了清华简《别卦》，然后通过多种材料的比较，分析通行本《周易》某些卦名得以定型的原因，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很高。

《万物皆有数》一书中的亮点还有不少，兹不赘述。化平博士能够对数字卦做如此深入的分析，与他长期积累、方法得当和对新材料的运用是分不开的。他2006年博士毕业来我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此之前就发表过有关数字卦研究的文章，来了之后又申请了相关的研究课题。为了搜集材料，他曾两次到云南丽江做调查，希望看到仍在民间使用的数字占卜法。利用民族志材料研究数字卦虽非化平博士首倡，但他尤其重视这点，并从这些材料中得到启发，提出数字卦研究要重视数字的文化含义。清华简《筮法》在阐述卜筮理论时，专门描述了九、四、五、八这四个数字的特殊意义以及在卜筮中的运用，这就很好地印证了化平博士的推测。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一大特色是出土文献的文献研究和语言文字研究，近些年来尤其重视并倡导对出土文献做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一是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即跨学科研究）；二是综合两类甚至几类出土文献进行研究。当然，这样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第一类综合研究的难度尤其大。2013年以来，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开始推出“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丛刊”（至今已经推出五种），同年联合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2014年开始推出《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的创刊号，并计划从2015年开始每年出版两辑。化平博士综合运用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入手，对数字卦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文献的考证，也有关于经典解释的讨论；既有出土资料的运用，也有民族资料的融贯，非常切合我们提倡的“综合研究”的旨趣。

化平博士是四川大学彭裕商学长培养的博士，他于2006年毕业来我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所工作，为人诚笃，宽以待人，人际关系好；他知识面广，学风纯正，醇学而不浮躁。尤值称道的是，易学是显学，但也是一门颇为艰涩的学问，不少人特别是年青人望而生畏，然化平博士不光能继承易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还善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善于进行田野调查，故他

的易学研究多有发现，多有功于易学的发展。在社会转型的当下，以“科研”为名的成果甚多，以“高产”著名的学者也不少，然向学者却不多，像化平博士这本《万物皆有数》的有分量的原创成果自然不多，故我虽不懂易学，也乐意向学界推荐这本著作。

化平此书写成后，即嘱余为之序，余难以辞谢，然诸事缠身，迟迟未能动笔，拖至今日方才草就，不免抱负歉意。以上短文，勉强为之，聊以充序。

张显成

2015年4月25日

于西南大学竭菴斋

《万物皆有数》序二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天人合一、太和中正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数千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和高度重视。几千年来，人们对《周易》和易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至今依然热度不减，高潮频起，而且业已成为全球性、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课题。近年来，关于《周易》和易学的研究更是有了突出的进展，大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易学文献整理编纂的新进展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是我国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项目，陆续出版发行的《儒藏》精华编收入易类著作 34 种，除了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著作之外，还择要收录了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写作的易学文献典籍以及一些出土文献资料，如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周

易》等。这些著作在编纂过程中一仍底本原貌，进行简要校勘，校记力求规范、精炼。

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主持的《中国易学文献集成》68册，收入了元代及其以前有代表性的易学文献约250种，1000余卷，均选精刻善本影印，堪称前所未有的易学文献集成。元代之后的易学文献，将以续编形式陆续推出。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与国学网合作整理编纂《中华易学全书》，包括《四库全书》经部易类177种典籍，1757卷，2800多万字，2000多幅易学图片。目前点校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易图绘制也已顺利结束，拟于近日正式出版。《中华易学全书》将按照《易经》六十四卦之数分装64册，采用繁体字横排，断以新式标点，特别是用计算机绘图软件重新绘制了2000多幅高清图，将古老的易学经典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二、《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研究的新动向

近年来，一批学者致力于对《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的认真梳理和系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对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易学史的梳理和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创新开拓的论点。比如，关于《易传》的学派归属，有学者认为，把《易传》简单归入儒家或道家都是存在问题的，《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家的思想在《易传》诸篇形成的过程中都有所展现。

又如，以往人们往往专注于历史上的那些易学名家、易学专著，近年的易学史研究则出现了新的特点，就是把易学置于中国整个文化思想的大格局下进行全方位审视，对易学的研究对象重新加以界定，这就大大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范围，能够把许多并非专以易学名家但确与易学有关的人物及思想都囊括进来。新近面世的《经学大语境下的胡瑗易学》（王洪霞）、《苏轼与〈周易〉》（徐建芳）、《以易测天——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翟奎凤）、《康雍乾三朝易学研究》（袁江玉）、《康有为易学思想研究》（张绪峰等）等一批专著，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

三、国外易学研究的新成果

易学的国外传播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周易》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成果。国外易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目前《周易》已先后被译为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日文、朝鲜文、俄文、荷兰文等十多种文字。各国纷纷建立从事《周易》和易学研究的学术组织，手段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和著述层出不穷，其中更是不乏拥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佳作。国外易学已成为易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成为国内学者从事相关研究重要的他山之助。

在这中间，《周易》的外文译本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卫礼贤致力于对中国典籍的德译，曾翻译大量中国文化典籍，其中《易经》译本是卫礼贤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译本，是在卫氏听取了劳乃宣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的基础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学背景翻译而成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称赞该译本：“在西方，它是无与伦比的版本”，“为理解《易经》原文的象征意义尽力开辟道路”。该译本已再版20多次，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传遍整个西方世界。2013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汉德对照的卫氏译本（张善文今译）。

国外汉学家在易学领域的耕耘、创获也是令人欣喜的。美国汉学家夏含夷教授早年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周易的撰著》，利用甲骨文、金文及传世的《诗经》互相比对考证，证明《周易》是公元前9世纪的作品。近年则更加注意以最新出土的文献来进行易学研究。比如夏氏认为，上博简《周易》足以表明在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时，这一文献就大体以今本的形式在流传了。著名美籍华人成中英教授作为公认的“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近年特别关注《易经》管理哲学，为易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教授，长期研究先秦思想和先秦文献，尤其重视易学研究，撰有《周易与原始儒学》等文章，并通过对比今本《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对比分析，来具体讨论《周易》与原始儒学的关系以及儒学

早期发展历史和《周易》哲学诞生等问题。池田教授关于上博简《周易》等方面的成果也受到广泛关注。

四、出土易学文献的新发现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世纪易学研究的新发现，乃是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出土易学文献的出现，其中重要的有敦煌卷子本《周易》、马王堆帛书本《周易》、阜阳汉简《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等。随着这些文献的公诸于世，许多学者又开始了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并将其与传世文献相互释证。

近年来，随着清华简《筮法》的公布及其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出土易学文献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热潮。根据有的学者研究，清华简《筮法》当是战国时人总结数字卦筮占方法并开示典型案例的著述，为三《易》之外的术数类卜筮之书。它系统确证了数字卦的真正存在，可归于早期“《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类，孟喜、京房或受到过其影响。《筮法》卦图可证四时、五行、八卦相配的情形在先秦已然发生，而不是晚至汉代。就卦名、次序、写法等内容来看，《筮法》确与《归藏》密切相关。这为研究先秦易占筮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也为厘清秦汉易学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以上是笔者对近年来易学研究新进展的大体总结和基本认识，其中或有不当和疏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我们注意到，在从事易学研究特别是出土易学文献研究的学者当中，西南大学王化平博士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者。化平博士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数占和数字卦的比较研究”、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易经》新释的整理与研究”，出版《帛书〈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等著作，在《考古》、《周易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成果颇丰。如今，化平博士又推出新著《万物皆有数：数字卦与先秦易筮研究》，集中收录了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易学问题的思考和心得，其中多有独到之见和精彩之笔，为易学研究的新开拓、新进展作出了贡献。阅读此书，笔者认为它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

色和优点：

第一，坚持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学术传统，坚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相互释证，既看重出土文献的独特价值，又强调传世文献在解决关键问题上的不可或缺作用。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日本学者池田知久教授也说过：“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简帛等新出土资料所具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过去那种仅仅利用传世文献从事研究的方法，已经无法期待取得什么进步。这虽然是事实，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传统文献及其研究就无意义、没必要了。传统文献及其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只是被附加了若干限制而已。”“为了促进研究的进步，把新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有效结合起来，是当今最为重要的课题。”化平博士谙熟今本《周易》及《左传》、《国语》等古代经典，又对甲骨文、金文尤其是新近出土的简帛文献有着全面考察和系统研究，他将二者完美结合，综合融会，自然使本书成为经典的“预流”之作。应该指出的是，化平博士早在其专著《帛书〈易传〉研究》中已经有过对出土文献研究方法和态度的深度思考，并且一以贯之地坚持至今，令人敬佩。

第二，注意借助少数民族文献来开展相关研究。陈寅恪先生在阐述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时强调，“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徐中舒先生则有“三重证据法”推出，即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来研究先秦史。杨向奎先生也曾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遵从先贤遗教，化平博士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数占与数字卦的比较研究，并在运用汉语文献材料的同时，将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相关材料引入其中，加以互证，多有新见，多有创获，这在书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第三，注意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有机融会。学者治《易》，一向有象数、义理之分，两者之间多有歧见和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易学的健康发展。《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序》曾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

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襍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化平博士既用象数考论，同时对义理之学的认识和把握也是非常精准、到位的，这在书中有着充分体现。实际上，就易学发展的规律而言，只有将象数、义理融为一炉，并重兼治，综合考察，才能在易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开拓。

第四，注意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的辩证统一。如何评定、衡量著述的高下，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在章氏看来，“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即独到的理论见解和扎实的文献考证功夫，两者只要能居其一，就非常难得了，但最高境界则是兼具两者，兼具“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在本书中，化平博士不仅考证精详，注解确当，而且在理论抽绎和宏观把握方面也富有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颇具开拓性、原创性，呈现出了理论总结与文献考证、“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

总之，不论是就研究内容而言，还是就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来说，化平博士的这本新著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启发意义，很好地体现了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堪称上乘之作、成功之作，相信会大大有助于易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的不断深化和拓展，值得学术界热切期待和高度关注。

张 涛

2015年5月

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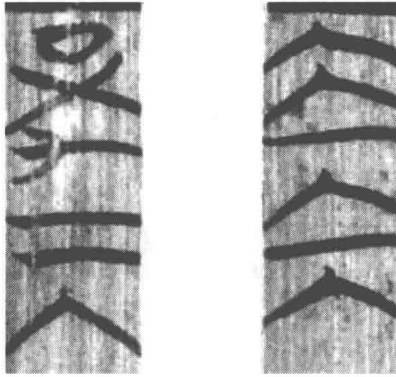
凡 例

一、本书正文引用简牍帛书资料一般用宽式释文，有争议处则在正文或其他合适的地方予以说明。附录中的资料采用严格释文。

二、正文中引用简牍帛书资料统一用“□”表示数量确定的缺文，用符号“……”表示数量不定的残缺，用“[]”表示整理者作出的补充。

三、由于古文字中的数字一般不难释读，且本书重点不在文字释读，为避免造字或文字中夹杂过多图片，故在引用数字卦资料时一般直接用横排释文，不照样录出原器物上的符号。比如在数字卦中“四”写作半圆形，较正常写法“又”少两笔。数字“五”写作“×”或“五”，数字“六”写作“八”，“七”写作“十”字形，“九”写作“九”或“九”，本书一律直接写成现在通行的字形。个别释文有争议处，则可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的讨论或节后表格中的备注。

四、清华简《筮法》和包山楚墓等地的卜筮简上，数字卦通常作如下形式（下例选自《筮法》，四个卦写在两支简上。而在包山等楚墓卜筮简中，四个卦写在一支简上）：



相应释文应为：

四 六

五 六

九 一

一 六

一 一

六 六

本书为排版方便，将之转写为：

六六一 六一六

四五九 一一六

相当于将竖排释文左旋 90 度。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数字卦研究回顾	2
第二节 数字卦研究的新思路	19
第三节 先秦易筮的基本情况	26
第二章 数字卦材料的整理与辨析	44
第一节 数字卦材料的整理	44
第二节 少数民族的数占与数字卦材料的认识	81
第三节 从甲骨卜法看数字卦例	96
第四节 楚简数字卦例与《左传》和《国语》筮例的比较	104
第五节 从筮法的角度看数字卦与《周易》	113
第三章 王家台秦墓“易占”简研究	123
第一节 秦墓“易占”简所见神话与其成书年代	123
第二节 从文本结构看“易占”简与传本《归藏》的关系	135
第三节 从卦名看《归藏》与《周易》的关系及“三易”问题	144
第四章 清华简《筮法》初探	158

2 万物皆有数

第一节	清华简《筮法》的抄写格式和文本结构	158
第二节	清华简《筮法》补释	164
第三节	清华简《筮法》的解卦方法	174
第四节	清华简《筮法》的占法	184
第五节	清华简《筮法》对数字卦研究的启示	198
第六节	《筮法》与《周易》及相关问题研究	208
结 语		241
参考文献		248
附录一	楚简数字卦例	264
附录二	《左传》、《国语》引用《周易》	268
附录三	丽江市郊区的石子卜	275
后 记		279